

# 新时期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方福前\*\*

西方经济学被大规模引进到我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进入 21 世纪我们还要讨论这个老问题，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取得共识。

站在 21 世纪的入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新时期，我们应当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视角来认识西方经济学。

## 一. 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性质？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其基本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它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因而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为制定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

大体上说，自约翰·穆勒(John S. Mill)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就逐渐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的探讨，把研究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上。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年初版)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里所说的“人”只是一般经济活动中的“人”，而不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歇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sup>1</sup>当罗宾斯(Lionel Robbins)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有各种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sup>2</sup>以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认为：“经济学的要旨是承认稀缺性是真实存在的，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sup>3</sup>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1、生产什么，生产多少？2、如何生产？3、为谁生产？4、谁做出经济决策，依据什么程序？<sup>4</sup>

上述这些定义说明，20 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进行研究，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和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这个研究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显然有很大差别。我们可以批评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研究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研究”(批准号为 05BJL047)的成果之一。

\*\*方福前，1954 年生，安徽庐江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

<sup>1</sup> 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 1 版，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

<sup>2</sup> 大卫·W·皮尔斯编：《现代经济学辞典》，380 页，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1 年。

<sup>3</sup>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2005), *Economics*, 18<sup>th</sup> Edition, p.4, McGraw-Hill Companies.

<sup>4</sup> 参见，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 2 版，中译本，11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和内在联系，只研究一些经济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正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或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研究这些问题，就难以了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运行规律。研究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固然重要，因为这种研究可以抓住经济问题的实质和根本。但是，对于认识日常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管理经济活动来说，把握经济现象（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了解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同样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我们的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本质关系，但是不能仅仅限于研究本质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对于普及市场经济学的知识，改变学生的经济学知识结构，提高我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和经济研究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理论认识，它是意识形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内容的“纯”科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学派在对经济问题分析的结论中和提出的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

在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性质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忽视或贬低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的一段时间，我国学术界的主流倾向是批判和否定西方经济学。当时把西方经济学的性质界定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西方经济学主要强调西方经济学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永久性辩护的经济学，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这种偏向指导下，讲授西方经济学的过程就变成了以批判西方经济学为主的过程。引进和介绍西方经济学似乎是为了给批判提供材料、提供靶子。另一种偏向是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否认西方经济学包含有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有些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就像数学和物理学一样，是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经济学是没有国界的，它在西方国家适用，在中国也一样有效，经济学没有“中”、“西”之分。

后一种观点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探讨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有其科学的内容，但它仍然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利益关系的社会科学，它不可能超脱政治、文化和历史而成为“纯”科学。这是由经济学自身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的。经济学研究的是具有情感并具有利益动机的“人”，而不是自然界中的“物”；而且经济学家本身也是有价值取向和利益动机的，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经济制度也是有不同信仰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当年直言不讳地宣称他在阶级斗争中是站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出版《通论》的目的是要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使这个制度恢复活力。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却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就是出于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信念不同。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论著中总是或明或暗地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率，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和价值观推广到其他国家。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最有利于个人自由、最有利于人们在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方面取得创

造性成就、最有利于为普通人提供最广泛的发展机遇的经济制度”。新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不但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而且主张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传统和信念也一并移植到非西方国家,他认为这些默识性原则是这种制度的基础。

因此,经济学的性质与自然科学的性质不同。经济学中虽然有许多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但是也有一些它赖以产生的那个地方、那个国度的“方言”。事实上,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内容。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 Reynolds)在他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年)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sup>5</sup>美国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t B. Ekelund, Jr.)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 Hebert)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时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sup>6</sup>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 S. Eichner)在谈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时明确地说:“新古典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相应的方法论。”<sup>7</sup>我们知道,正是新古典主义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调。

## 二. 在中国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

根据以上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判断,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我们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在经济研究中,不能不加分析、不顾中国的实际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联系中国实际来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并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成为能够说明中国经济问题的有用的工具。

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包括三重涵义:第一,把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经济实践相结合;第二,对不适合中国实际的那些西方经济学结论进行改造调整;第三,分析和摈弃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包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的理论或结论。

为什么要提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如何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

即便撇开制度差别和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西方经济学也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它们的产生和发展莫不如此。我国现在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有三方面不同:其一,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正处在追赶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时期。其二,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新旧体制都将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其三,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

<sup>5</sup> [美]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中文1版,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sup>6</sup> [美]小罗伯特·埃克伦德和罗伯特·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文1版,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sup>7</sup> [美]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1版,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特有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类研究，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哪些结论是和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哪些观点包含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哪些内容是目前我国经济条件不具备、不成熟而暂时不宜用的？哪些内容是应当摒弃的？

在自然界，淮南的“橘”之所以到淮北变成了“枳”，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气候和环境不同。同样的规律也适合经济学。如果我们不注意中西方的差异，不加区别地把西方经济学搬到中国来，也可能会出现“西橘”变“中枳”的结果。

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不但要掌握其结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把握具体的理论赖以产生的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经济背景，还要注意不同的经济制度(或体制)、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所造成的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的动机和目标的差别。这些差别和不同就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在西方是正确的结论在中国现阶段可能是不正确的；在西方有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现阶段不一定有效。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一书中谈到西方经济学与南亚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时说：“……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sup>8</sup>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雷诺茨(Lloyd G. Reynolds)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欠发达经济分析。他指出：“人们把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时，很少会发现这些工具是完全适用的或完全无用的，一般是经过适当的改造有些用处。”<sup>9</sup>

我们可以举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具体的理论来说明我们的上述观点。

就目前来说，中国居民和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是不同的，因而中美两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所包含的自变量或者消费函数本身是有差别的。用现在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消费函数理论似乎难以合理地解释中国居民的储蓄数量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

目前中国的企业有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经营户，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目标函数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国国有企业不能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国有企业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如果用西方流行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统一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西方产权经济学只关注如何设计产权制度来处理好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如何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并约束其对所有者利益的侵害，很少关心如何调动企业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如何处理好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这是因为，西方学者是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和雇佣劳动制度下来讨论企业问题的。我

---

<sup>8</sup>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文1版，9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sup>9</sup> [美] 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中文1版，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国的企业则以国有企业为典型代表，我们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谈产权，而不谈工人的劳动权。我们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而不是雇佣劳动者。我们要搞活搞好国有企业，必须唤醒广大工人的主人翁意识，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在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时，应当有这样的基本判断。

菲利普斯曲线是根据 1861-1957 年英国的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得出来的一个经验结论，后来经过利普西 (R. G. Lipsey) 和萨缪尔森等人的改造，这条曲线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的替换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时，至少要做出两点分析：其一，这条曲线是建立在劳动的供给是货币工资的函数的假设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当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就业率或失业率）发生变化时，货币工资会发生变化，而货币工资的变化会通过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导致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这就使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有了一种交替关系。这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经济条件是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都是发达、成熟的市场，货币工资形成机制和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是完善的。其二，它所描述的关系已经被一些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事实所“证实”，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情况，也不能证明它适合一切国家的经济情况。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分析，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得出一个形状怪异、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曲线。

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利息率是市场化的利息率，而中国的利息率目前是高度管制的利息率，这两种利息率的决定方式和变动规律都大不相同。因此，建立在市场化利息率基础上的有些理论不能照套过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投资增加会通过利率提高来排挤私人投资的理论，IS-LM 模型所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利息率下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来刺激投资的机制，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我国目前的相关的经济问题。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和改造。

那么，如何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可以正确地用于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呢？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对西方经济学实施以下三种“手术”，通过这三种手术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中国化”改造。

一是“剔除术”。这是为了剔除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内容。比如西方经济学中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终极制度的内容，论证发达国家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有理的内容，论证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平等规则合理的内容。

二是“整形术”。西方经济学中的有些内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需要经过调整和改造来进行运用。例如，近些年一些中国学者在学习、借用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构造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提出了适合中国现阶段情况的 IS-LM 模型。

三是“移植术”。所谓移植术是指联系中国实际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改革发展中的经济问题，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根据我们前面所述的西方经济学的性质，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没有阶级性和国情差别的，在西方可以用，在中国也同样可以用。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总供给-总需求分析，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消费、投资、净出口与总需求的关系分析，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和以运用为主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和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大体上是一致的，是和我们的思想解放进程大体是同步的，也是和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大体上吻合的。一方面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由批判为主转向以运用为主。我们认为，大量运用西方经济学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需要。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创立一种适合中国实际需要、能够解释或描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径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需要走“三化”之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必要准备之一。

###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 [美]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中文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2.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文1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3. [美]小罗伯特·埃克伦德和罗伯特·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文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 [美]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 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6. 大卫·W·皮尔斯编：现代经济学辞典，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1年。
7.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2005), Economics, 18<sup>th</sup> Edition, McGraw-Hill Companies.
8. 参见，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2版，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编 100872

电话：010-62513337(H)，62511102(O)，13911138115

Email: fangfq@ruc.edu.cn